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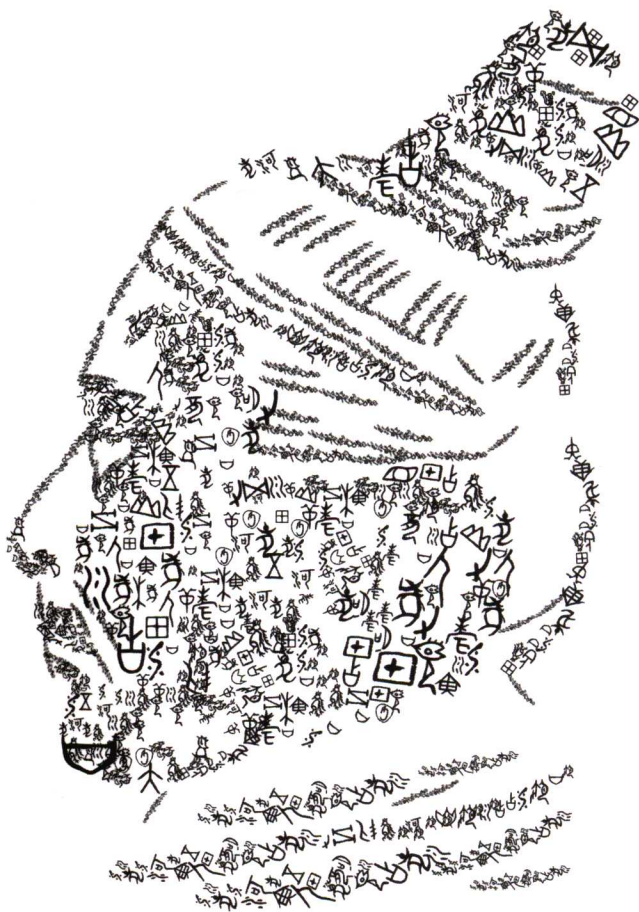
头颅中国

(最新修订本)

先秦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先秦的精神正是中华文明高贵的头颅。

另一个角度看先秦

黄摩崖◎著





头颅中国

黄摩崖◎著

另一个角度看先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黄摩崖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6.1

ISBN 978-7-216-08615-8

I. 头… II. 黄… III. 文化史—研究—中国—先秦时代 IV. K2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39573 号

出 品 人:姚德海

责任部门:大众纪实分社

责任编辑:赵世蕾

封面设计:水玉银文化

责任校对:范承勇

责任印制:谢 清

出版发行:湖北人民出版社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数:359 千字

版次:2016 年 1 月第 1 版

书号:ISBN 978-7-216-08615-8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张:25

插页:2

印次: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2.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本社旗舰店:<http://hbrmcbs.tmall.com>

读者服务部电话:027-87679656

投诉举报电话:027-87679757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头颅中国



再版序

2011年，幸逢一段机缘，摩崖在湖南省龙山县里耶镇待了近一年时间。此地出土了3.7万枚秦简，据这些秦简显示，里耶在秦代属洞庭郡迁陵县。那段岁月我几乎每日都会在长堤上行走，寂寞时便安慰自己，我与先人望着同样的山川与月亮，多么的幸福。

我也总想写出点什么，于是就动手写了这部小书，于2012年1月在网络连载，于同年6月获得网络赛事奖项，于同年10月定稿，次年7月出版。本次修订版的面世是我一年多来最为挂怀之事，因为作品须赶上作者的变化，还有太多地方需要补充和完善。

这部小书并没有着力探讨中国文明的原始形成，而是主要讲述了“先秦”与“秦”之间的“爱恨情仇”，待尘埃落定，早期中国文化的性质与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便莹澈可观。

我将本书所运用的历史观名之为“头颅史观”，看官们虽未必用，倒是可以观一观的。

“头颅史观”——

1. 莫为砍头辩护，历史不只是胜利者的历史。

“一代有一代之中国。”中国文化是活态的，代有特色的，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这是国史的基本原理。历史也不总是前进的，相反，历史是曲折的甚至是经常倒退的，读史者和治史者都应学会接受被砍脑袋的历史遗憾，从“文明折于野蛮”的教训中懂得大道，而非为一切斩首辩护。虎狼之秦是华夏文明轴心时代的终结者。

2. 且问头痛与否,历史终归是人生的历史。

修正以往的文明标准,评价历史应以人的存续状态为标准,世界不完美,因从无彻底之文明性,古典未必不文明,现代未必文明。

3. 从头开始,历史终归是千头万绪的历史。

如果历史有“韵律”,不妨从第一个音符听起。回到事物的本初状态,充分估计人事的复杂,相信历史本有多种可能,以灌输“必然论”为羞耻,且警惕那些坚持从历史中找出所谓“铁律”的努力。还原历史走向的不确定性,在信仰上为文明的参与者提供恒久的引导。

4. 重视头脑(思想),历史终归是传统的延续与英雄(圣贤)的历史。

先秦是国史之主脑。先秦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先秦思想是中华文明高贵的头颅,重返先秦去寻找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是理所当然。“头颅”自然可以象征天生之性命、奉献之勇气、生活之智慧、人格之尊严、社会之理想与历史之信仰,甚至是对英雄的隐喻,但它更是对优质之古典与高贵之传统的一个总喻。攻击一个文明的源头以及传统,就是野蛮部落的“猎头”行为,是一种攻取敌方战利品的心态。

中西各有圣贤,各有传统,世界文明和而不同,标榜“普适”会带来侵害,我们要求索自己的“道”。文化界若只迷醉于西学范式,而不懂如何以中国之“精气”与“理路”去解释中国,则西方价值日趋神化,中国价值日趋遮蔽,长此以往,中国人将自绝于中国文明。“为故国招魂”的事业一刻都不能松懈。国人决不能丧失对国族文化的自信与尊崇,既应对中国文明史有同情之了解与温情之敬意,也应对中国人之未来充满期望。

顾颉刚先生曾言:“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罗列史实,缺乏见解。”我不认为自己能著中国通史,“分门纂类”之事也实在有太多人做过,我只是用“集”的方式谈一谈“经”“史”“子”,也许就叫作“史记文学”吧。虽说不上“发愤著书”,但自信能有一些经得起检验的见解。

2014年10月10日于湘西不隐斋



目 录

第一话 青铜不等于青史 / 1

- 1.1 禹域神迹 / 1
- 1.2 文明底稿 / 5
- 1.3 文明档案 / 9
- 1.4 汉字圈 / 13
- 1.5 在天之灵 / 17

第二话 上帝之死与革命 / 21

- 2.1 堕落与酒 / 21
- 2.2 上帝倒戈 / 26
- 2.3 生死存亡 / 30
- 2.4 审判纣王 / 33
- 2.5 白旗之悬 / 36

第三话 奠基时代的英雄 / 40

- 3.1 西伯养老 / 40
- 3.2 箕子启蒙 / 43
- 3.3 姜尚东进 / 46
- 3.4 二次革命 / 49
- 3.5 性革命 / 53
- 3.6 召公路线 / 58

第四话 文化转向与祛魅 / 61

- 4.1 信仰温情 / 61
- 4.2 巫术迟暮 / 64
- 4.3 奴隶为人 / 67
- 4.4 人兽鬼 / 72
- 4.5 鼎革之义 / 75
- 4.6 天上天下 / 79

第五话 古典礼乐联邦制 / 83

- 5.1 血脉铺张 / 83
- 5.2 国野二元 / 86
- 5.3 礼乐黏合 / 89
- 5.4 礼教识人 / 92
- 5.5 封建赠礼 / 96

第六话 专权以蛮族之名 / 102

- 6.1 战时体制 / 102
- 6.2 双重威胁 / 105
- 6.3 专权效应 / 109



6.4 傲慢偏见 / 113

6.5 猎人笔记 / 116

第七话 贵族精神的正午 / 121

7.1 高贵姿态 / 121

7.2 诗人前世 / 124

7.3 理性早启 / 127

7.4 行为艺术 / 132

7.5 史教风骨 / 138

第八话 华夏世界的裂变 / 145

8.1 畏乱源头 / 145

8.2 “国际”笑话 / 148

8.3 特殊之邦 / 152

8.4 好战穷兵 / 156

8.5 名利之场 / 162

第九话 都会的白天黑夜 / 166

9.1 神圣土地 / 166

9.2 工商城市 / 169

9.3 两种时间 / 173

9.4 国富论 / 175

9.5 顺逆鸿沟 / 181

第十话 乌托邦与集中营 / 1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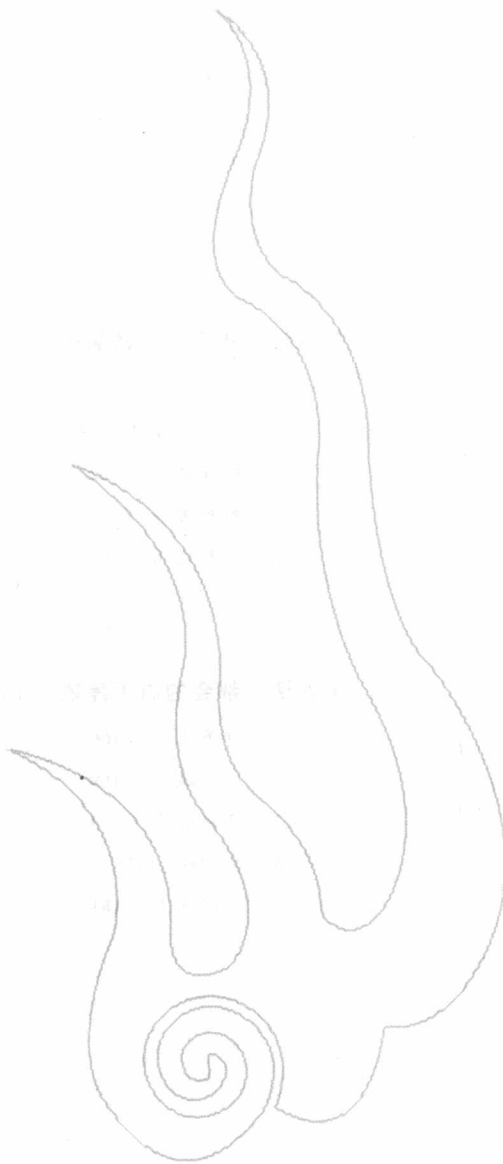
- 10.1 天地道教(上) / 186
- 10.2 天地道教(下) / 190
- 10.3 人间世 / 193
- 10.4 近墨者赤(上) / 197
- 10.5 近墨者赤(下) / 201
- 10.6 仁贩子(上) / 204
- 10.7 仁贩子(下) / 209
- 10.8 动物庄园 / 213

第十一话 儒法间的罪与罚 / 217

- 11.1 精英主义 / 217
- 11.2 法的精神 / 220
- 11.3 罪与罚 / 225
- 11.4 保守主义 / 229
- 11.5 平庸主义 / 232

第十二话 最早博物馆之殇 / 238

- 12.1 文庙之殇 / 238
- 12.2 盛名之下 / 241
- 12.3 子不语 / 244
- 12.4 邯郸学步 / 249
- 12.5 欲加之罪 / 254
- 12.6 寻其头颅 / 259
- 12.7 大道之行 / 262



第十三话 士人堆里觅真儒 / 267

- 13.1 自强不息 / 267
- 13.2 沧海之士 / 270
- 13.3 道统所系 / 274
- 13.4 愚忠愚孝 / 278
- 13.5 圣教真传 / 282

第十四话 秦楚与南土经略 / 2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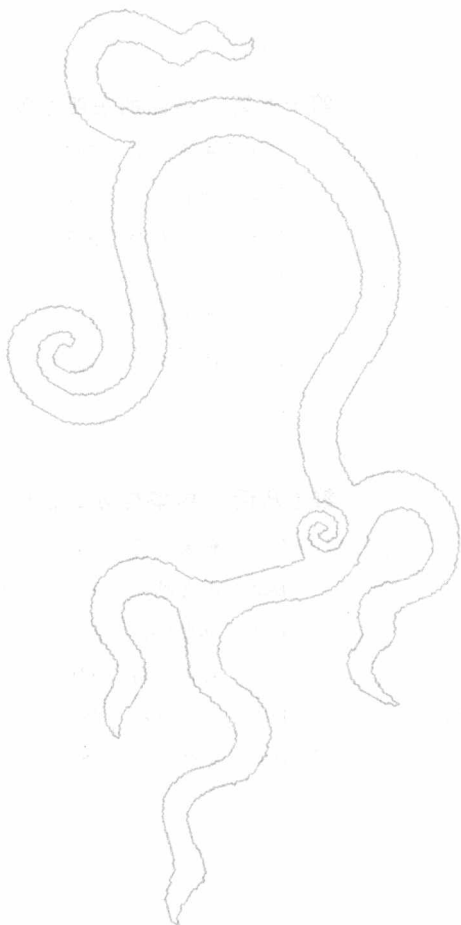
- 14.1 天王之憾 / 287
- 14.2 南土称雄 / 290
- 14.3 西方虎狼 / 294
- 14.4 要害之郡 / 297
- 14.5 面朝南海 / 303

第十五话 鱼肉相忘于江湖 / 308

- 15.1 疲民之恶 / 308
- 15.2 法的陷阱 / 311
- 15.3 胜者为王 / 315
- 15.4 贪天之功 / 320
- 15.5 南辕北辙 / 323

第十六话 历史选择与进退 / 327

- 16.1 走出必然 / 327
- 16.2 历史大势 / 330
- 16.3 历史选择 / 334
- 16.4 进退之辨 / 338
- 16.5 历史遗憾 / 342



第十七话 道路的东西之争 / 347

- 17.1 东方没落 / 347
- 17.2 屈打成招 / 351
- 17.3 如此东西 / 353
- 17.4 贵远贱近 / 357
- 17.5 厚今薄古 / 360
- 17.6 他山之石 / 363

第十八话 中华与历史信仰 / 367

- 18.1 独夫尸臭 / 367
- 18.2 历史眼界 / 371
- 18.3 历史信仰 / 374
- 18.4 宅兹中国 / 378
- 18.5 淮橘为枳 / 382
- 18.6 其命维新 / 388



第一话 青铜不等于青史

1.1 禹域神迹

20 世纪初,饱经磨难的中国大地上演了一场场关于“黄帝纪年”的热烈讨论,方家各显神通,“挨的挨,擦的擦,推的推,压的压,扯的扯,拉的拉”(出自《西游记》),黄帝元年却未蹦出一个定数。

1922 年,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正在为商务印书馆编纂中学历史教科书,他破天荒地提出了著名的“古史是层累地造成”说,引起轩然大波。据他本人回忆,戴季陶先生当时写信给教育部要求取缔此书,还提议要按每册一元来处罚商务印书馆(以发行量计算也就是 160 万元巨款)。戴氏愤怒的理由便是“这样取消了中国民族的信心”。此真儿曹之言。

国人向来已习惯中国的古老,而且大有“越老越傲”的倾向,动辄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平起平坐,古希腊甚至难入法眼。公元前 2 世纪的司马迁已将黄帝作为古史的正式开端,并提供了夏王世系。而到了公元 3 世纪的名医皇甫谧那里,他编纂的《帝王世纪》更列出“三皇五帝”的详尽世系。所谓“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国语·晋语八》),列位看官应能体会到传统史学为国族延年益寿的“壮心不已”,只是“老而弥坚”的状态需要值得信赖的保养法。

信史带来信心。给洋人推介国史,需一分勇气,三分才气,六分底气。底气者,终归不离谨慎之默证法与去臆存真之精神。

古文献中那些夸饰的英雄形象并非全无根据,哪怕向壁虚构也需最原始的素材。如“牛头人身”,应先想到其所戴面具;又如“兽身人面”,

可能是其文身醒目。《越绝书》有载：“昔者神农之治天下，务利之已矣，不望其报；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之；不以其智能自贵于人，而天下共尊之。”根据摩尔根的启发，此处的真实景象应是原始社会中平均主义的经济生活与无政府的政治生活。燧人氏、有巢氏、神农氏、伏羲氏、黄帝、炎帝、蚩尤、大禹等，这些今人耳熟能详却模糊的巨人，其原型都是古老氏族的部落首领，他们处于文明的前夜，而他们的传奇事迹则靠进入文明时代的“后人”来追忆补述。

“五帝”为谁，其天知乎！而周人钦慕之夏朝也不宜归为信史。

殷人甲骨文中并无提及“夏”者，或者说博考之后学尚不能识得如此重要的一个“夏”字。所谓“无征不信”，公元前6世纪的孔夫子已苦于文献之不足征。遂公盨（西周中期）上有“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的字样，此言应与“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诗经·大明》）属同一话语系统。再拿《尚书·禹贡》中的“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诗经·商颂·长发》中的“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与之对照，最后联系“禹治水，益治火，后稷治土”（《郭店楚简·唐虞之道》）的英雄系列传说，大禹的神力明显归为神话较妥。

英雄治水的神话流布甚广，盖因分布于黄河流域的诸部落都有“洪水滔天”之阴影。中国神话的特色在于，陆地并不起源于水，即“水”从未单独成为世界演变的一个层面。神话学大家坎贝尔曾有论断——几乎只要是看过海的民族，他们的神话，都会把生命说成是起源于海洋。故神话里没有太初“原水”这一母题，便很能证明中国先文明时期的主体族群并未直接与海洋建立关系，这是海贝能够成为内陆原始货币的前提。

处于原始社会的人类平均寿命很短，与今日的人类相比，他们在此星球上徒作勾留。故欲做“彭祖”的情结，可堪同情。此并非责怪自然如何强暴，而是叹息人力太过孱弱。治水如救世，英雄成大神。周人志在天下，故以鲧、禹父子为原型，使其走遍九州的传说鲜活饱满。“奕奕梁山，维禹甸之”（《诗经·韩奕》），“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诗经·信南山》），联系“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诗经·天作》）一句，可明显感到禹

被周人视作英雄祖先。周公的后代祭(zhài)公谋父在周室任职,他曾对周穆王这样说:“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国语·周语》)

列位看官,解读神话有多面意义,并不只在享受好故事的乐趣,还应揭示其间的象征与隐喻。虞、夏之存在是无疑的,但他们“目前”只是作为部落存在。禹如何可能派人成功地丈量大地东西南北四极之间的距离呢?“禹会诸侯”“禹划九州”的传说更像是周王朝对上古部落整合的“现代性”描述。我们若强说这些名号不一的部落是“历历如指掌”的国家,则会使文明的评价标准倾覆。

何谓“文明”,宜中西结合而论。《易经·乾卦》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此大有道德上的光明倾向;而英文中的“文明”(civilization)一词则源于拉丁文“civis”,实际上的先进意味十分浓郁。无论从何种角度,达到文明都必有一定标准。文明,或者说国家起源,其标准由西方学界首倡,然而,推行硬标准多是霸道的,因为标准总与特定的环境条件相勾连,如埃及可说是小麦文明,美洲可说是玉米文明,不一样的天,不一样的食。像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提出人口要达五千以上,这只是一名欧洲学者以其见闻,得其所思,不能放之四海。且看文明的基本共识——

其一,文字,用以记载。

其二,城址,承载阶级分化与权力机构,体现为宫室文化、宗教礼仪、经济活动。

其三,金属冶炼,尤以圆熟的青铜冶铸技术重塑懵懂的原始艺术。

以上文明要素皆有各自漫长的发展过程,但不能因有一点苗头便说是参天大树,这是学术上的揠苗助长。更关键的是,单一要素不能独挑大梁,须齐备生效,因为文明是一种体系。最初的“天下”只能是中国新石器文化的集合,即便不用“满天星斗”来形容,至少也是百花齐放。就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史前文化均难称文明。

何为“文明”,言虽不中,亦不远矣。“文明”代表着一种从人力、人心两方面抑制非正常死亡的能力。其间,人类不断增加对自然世界与自我世界的了解,大幅度地提升了技能与智识,随之而来的是从容之气

度和包藏之机心。纵观人类五千年的历练，精神与物质的相得益彰应是文明的终极意义。当然，“文明”也是一种目的性的断代，根据目的之大小，标准有松有紧。既然如此，文明的落脚点在“人”。于是我们既要考察人与人关系的变革，也须着眼人群整体的气象变迁。故“文明性”绝非线性发展，未必与时俱进，也就是未必古不如今。

言归正传，文明时代整理了关乎“文明性”的经典传说，禹终被定位在与周人始祖后稷同时代的人物，他被刻画得近乎完人，“薄衣食，卑宫室”的“朴素”，“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公心”，俨然使他成为群体利益的代表与“全人类”（眼界所限）的英雄。既然周人的始祖曾与禹同舟共济，那么禹的天下最终轮到周人的手里也就不稀奇，逻辑就是“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国语·郑语》）。或者说就是“有德者居之”，孔子后来讲泰伯“让天下”是至德，并非是赞扬王位禅让给外人，而是认为泰伯能知基业得来不易，尽量和平交接，不败王家之德。

经儒、墨两家的追美，大禹连同尧舜成为华夏的文明符号，此后的数个世纪，“大禹”之名号传遍周天下，连南方的楚人都耳熟能详。屈原便问道：“鲧何所营，禹何所成？”（《楚辞·天问》）西鄙之秦人竟也说自己的—位祖先大费“与禹平水土”，既然如此，那么天下他们也该有份。传闻累积到一定程度，也就有了“大禹之时，诸侯万国”的时髦说法。战国人士假托大禹作了《禹贡》—书，秦始皇更是“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颂秦德”。

华夏文明不断向周边推拓，年代愈后，遭遇的族群问题也就愈繁杂，随之而来的是信仰冲突与神话系统的交错，结果上古英雄与先圣王越来越多，以致出现了“同姓而异其国号”的说法，这实是凝合族群的一种宣传手段。大禹有了一大串后裔，炎、黄亦是如此。更进一步，则会有“大团圆”的说辞：“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孙也。黄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泽深后世，故其子孙皆复立为天子，是天之报有德也。”（《史记·三代世表》）此种观点明明白白是出于“观之当世，推之上古”，拆穿这等历史手法有何不可？

“禹域”“禹甸”毕竟成为了中国之代称，甚至到 1876 年，缅甸国王

在一份致清帝的奏表中还表达了缅甸愿意成为“禹域”光荣一分子的愿望。今日中国还有数省建有禹王庙，而“大禹”竟有着一系列的出生地，一块“岫嵎碑”，也因疑似夏禹遗迹而备受关注。

当今中国已驱散了许多古史的迷雾，也早过了那个脆弱敏感的年代，更发现“禹是一条虫”或者“伏羲与盘古是葫芦”也可堪商榷。面对传统文明，现代的中国人若只是感情用事而不去实现“创造性转化”（林毓生先生所提），我老大中华即便宣称有九千岁也只是一种倚老卖老。蟑螂的历史可比任何国家的岁数都长。

凡爱国族者，该少一些“五千年文明”之类的“口号”，应警惕那些有“溯源癖”（或叫作“寻根癖”）的学者，因为臆想与胡说是他们的职业病。当满纸炫然的“本纪”与精美绝伦的青铜器呈于眼前，“爱美之心”难免为之一振，他们的自豪感也随之泛滥。他们自然不会放过蛛丝马迹，向上则推演千年，炮制文明，向下则竭力在夏、商、周的时空框架间连根结脉，拼凑“因果关系”，以便制作“王朝链”。如将铸造于公元前 16 世纪之前的青铜器直接贴上“夏代”的标签，此事太过常见。

“夏”在考古学中的辨识度若不清晰，则必然沦为一个从典籍之中抠出来随处张贴的大字报，一个飘荡于洛阳铲下的幽灵。对于浮于玄想的东方米诺斯文明，史家夙愿之达成尚待地下新篇来“证经补史”，尤其是殷墟这般革命性的考古发掘成果。

1.2 文明底稿

“青铜”乃红铜、锡、铅的合金，熔点低、硬度大、可塑性强，先民发现其适用于铸造兵器、机械零件和生活用具等。青铜是人类史上一项至大发明，它的盛行标志人类历史进入了“青铜时代”。1975 年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约公元前 3000 年左右）出土了一件青铜刀，这是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一般被用作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证明。

史界历来不乏文明西来的论调，甚至认为最初的远东文明是照搬西亚文明而来。亚欧大陆上文明的发展序列似乎已然排定，而处于过

渡地带，有如奇崛天降的三星堆文明更是使种种文明西来说变得真实可信。如果我们是在描述一件商品的产地，那么区分“本地”与“外地”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我们是在探讨一种文化的形成，那么必须跳出这种“产地”思路，更注重文化性格与气质，因文化本就不是一件死物。英雄形象愈多，文化活力愈盛，文明动力愈足，在中国，从古史传说到东周文明皆可印证。其实，人类本是同源，而人类文明的起源问题与人类的起源问题不同，没有谁可以放言所有人类文明都是同源的，就说新大陆的墨西哥、秘鲁，与旧大陆远隔重洋，很难说他们的文明不是独立起源的。

对比世界诸文明，商这个青铜文明可谓起源不明，虽延绵久长，但较为后出。如西亚地区早在四千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人工冶铁，而商朝才开始少量使用陨铁制品，对铁也只算有了初步的认识。中国人掌握冶铁术大致在西周晚期，而全面运用铁器要到西汉中期。可这恰恰证明了东西文明发展的不同步，既然不同步，那么所谓的“文化传播”内容也不可能“一以贯之”。借助日新月异的探源科技，固然可以指证铜器西来，黄牛西来，绵羊西来，家马西来……可文明本不是“西来”二字可以说透。商文明里也许有西方元素，但它无疑是独立成型的。

在他人眼中，商是世界古文明的中心之一。

在自家眼中，商是周乃至中华文明的底稿。

国家与文明是同步的。中华历史上的国家出现在公元前 16 世纪左右，即“商”。汤向来被公认为第一代君主，这明显比禹被当作夏朝的创立者可信得多。汤带领族人定居亳，对部族的发展作出决定性贡献，在甲骨文中可以看出，他是商人祭祀的祖先神。亳之所在尚无定论，盖位于商丘附近，而它作为国家都城便具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意义。位置确切的殷墟作为商晚期的都邑长达两百多年，故商人后来被称为殷人。然而，亳是殷人的祖灵与乡愁的好所在，从“亳”字高耸的形态上分析，它应代表着早期商人心心念念的神性巨宅。殷周革命之后，作为亡国之戒的亳社成为了多处殷遗民的精神归宿。

商、周有着不同的族源地，此问题聚讼日久，难有定论。若从具有明显的部族特征算起，商族可能起源于东边的晋南地区（也有冀南豫北